

整風運動研究

第一集

張鐵君 著  
勝利出版社印行

# 整風運動研究第一集目錄

- 一、批評與自我批評
- 二、以馬列主義之箭來射中國革命之的
- 三、對於中國問題慕視無觀
- 四、粗枝大葉自以爲是
- 五、對敵友我三方面的動態全不了解
- 六、對於中國昨今的歷史漆黑一團
- 七、爲馬恩列斯而罵恩列斯
- 八、一個結語

整風運動研究 目錄

116  
D264  
11



3 2285 9739 3

# 整風運動研究 第一集

## 一 批評與自我批評

此次毛澤東在共產黨黨校的開學典禮上，演講整頓「學風」，「黨風」與「文風」因而引起了中共全黨的整風運動。為什麼要有這一次的整風運動？因為他們的黨，據毛澤東自己說，「還是有問題的，還是有缺點的，而且就某種意義上講，問題還相當嚴重」。嚴重的問題有三：一個是思想問題，一個是黨內黨外的關係問題，還有一個是語言文字問題。在這三個問題上，他們的同志，還頗有不大正派的作風。所謂學風不正，就是指的「主觀主義」；所謂黨風不正，就是指的「宗派主義」；所謂文風不正，就是指的「黨八股」。這三股歪風，自從中共開始組織以來直到現在，時常在他們的黨內作祟，現在毛澤東提了出來作一番自我檢討，驟然看來，自然是一種使人注意的現象。

整風運動研究



(南)

本年四月三日由英宣傳機關根據毛澤東的報告，曾指示各級共產黨員，進行批評及自我批評。據說，這一次的批評工作是嚴肅的，既不惜批評別人，又不怕批評自己。他們時要求批評的態度，是嚴正、澈底、尖銳。同時又要坦白、誠懇。這是說的好聽，究竟他們是否做到了此點，固然還很難說了，不過使我懷疑的有一個很大的缺陷。毛澤東的報告對於他的全黨黨員的批評，也可謂到了嚴正澈底尖銳的程度，但他們全黨的黨員，有沒有人敢於對毛澤東自己的作風也來一個嚴正、澈底、尖銳的批評呢？若果有的話，這個對毛澤東的胆大批評者是否會被逮捕槍決而加以一頂叛匪漢奸的帽子呢？而毛澤東本人又是否肯虛心地誠懇與坦白的接受呢？幾個月以來，我總不見到他們下級黨員奉命而行的相互批判，還沒有見到有一個下級對於上級的明白批評。至於他們小同志對於「毛主席」的批評，在他們特殊的黨紀中，那當然是亘古未聞了！共產黨是一個名為民主而實為集權的黨，黨員對於領袖的言語行動向來絕對不能疑問。這個工作，既然不能實望於他們自己的下級「同志」，也不能實望於他們同列的「中央委員」，所以用着澤

取自己製造的鏡子來照一照他的原形，那實在是我們義不容辭。

期間中國共產黨的黨史，毛澤東的名字，好像不能從共產黨分割開來。中共開始於民國九年（即一九二〇年），毛澤東的加入却在民國十一年（即一九二二年）。中共的領袖自陳獨秀，經秋白，李立三而後，毛澤東也逐漸升於領導的地位。他不但握有黨權，並且也握有軍權。自十六年在井崗山落草時起，直至現在流奔延安為止，他實在是中共最有實權的領袖。所以說中共自民國十一年以後的錯誤行動，毛澤東要負大部份的責任，決不是過甚其辭。中共的學風黨風文風之壞，毛澤東何能諉卸其責於他的全黨「同志」？我們試想，中共的下級同志若沒有上級領袖的指導，說他們能自由活动，自我負責，那才是像太陽從西方出來一般不可想像的事。

共產黨是一個以槍字樣形式而組成的黨。那坐在最尖端寶座的領導者，就是全黨的唯一動力。他是恰和唯物史觀的濫調相反，乃以上層建築而決定下層建築的。什麼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執委全體大會，這些都不過是戲院的前台而不是其後幕。一切提議及其

決陳案，甚至於提案者，副署者，贊成者，反對者，都是事前業已內定好的，早由那尖端實際上的批准而提出大會，以完成他導演工作上的手法而已。老實說，中共的每一代表大會和中執會議，實與一齣戲劇的演出無異，劇本早已寫就，台詞與動作，也早已經過導演的修正，毛澤東先生便是那著名導演之一！

中國共產黨的作風自李立三下台以後，事實上已逐漸轉移在毛澤東導演之下。倘若整風運動祇反省全黨的作風而不先檢討一下毛澤東的作風，這便是不分主從，一定弄到一塌糊塗。

毛澤東的作風，要檢討起來，真是一部廿四史，不知從何說起。一篇報紙，未免太長，現在我們對於抗戰前的舊事，暫且不提，姑且從抗戰後的毛澤東的風派開始。他的作風，自然也不外乎道三股一歪風。

我們先說第一股的學風。毛澤東的學風，究竟是一股正風，還是一股歪風呢？這是應該用他的鏡子來較詳細的加以分析和檢討。過去美國的「紅」新聞記者斯諾先生，到了

所謂西北的邊區巡禮以後，曾說：

毛澤東是合併了鄉村的天真，奇怪的性格，以及銳利的智慧和世俗的詭辯在一起的。『見「紅星下的西北」』這話的確是一個正確的描寫。所謂毛澤東的世俗的詭辯，斯諾還舉了一個有趣的例：

「有一天晚間吃飯的時候，我聽見他（毛澤東）講一種喜歡吃辣椒的人，常是革命的理論家。他第一舉出他自己的省份湖南，是由於出產革命家而出名的。接着他列舉西班牙，墨西哥，俄羅斯，和法蘭西來擁護他自己的理論。可是當有人提出著名的意大利人，喜歡吃紅辣椒和大蒜，來反駁他的理論的時候，他只好發笑也承認自己的失敗。」（見同上）

由這一個畫像看來，毛澤東的學風，確實的帶有些詭辯意味。然而這是外國人的眼中中反映出來的。我們要檢討毛澤東的學風，最好還是要用他自己製造出來的鏡子。

## 二 以馬列主義之箭來射中國革命之的

毛澤東說：「主觀主義是一種不正派的學風，他是反對馬列主義的，他是與共產黨不能並存的。」但是試問：何謂主觀主義呢？據他說：「主觀主義有兩種：一種是教條主義，一種是經驗主義。這都是祇看到片面，沒有看到全面。」這兩種主觀主義還是教條主義最為危險。他以為「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只有一種，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向客觀實際得到證明的理論。脫離實際的理論是空洞的」。馬列主義是馬恩列斯根據實際創造出來的理論，是從歷史實際與革命實際中抽出來的總結論，我們如果僅僅護了它，但是沒有根據它來研究中國歷史實際與革命實際，沒有創造出合乎中國實際需要的，自己的，特殊性的理論，我們就不能妄稱為馬克斯主義的理論家，那就是一個十足的主觀主義者」。

理論原須根據於事實而又從事實得到證明，這當然是誰也不能否認的真理。毛澤東



到今天也居然認識了這一點。然而我們要追問，中國的客觀實際是否完全與歐美的客觀實際相同呢？從歐美的客觀實際抽出而又得到證明的馬列主義，是否也能夠從中國的客觀實際抽出而又從中國的客觀實際得到證明呢？不同的客觀實際，是否也能夠抽出同一的主義呢？若果說可以，那末，中共認爲今日之所必需的三民主義便可以不存在了，否則他們的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客觀實際上還會有什麼根據？

我們姑且承認馬列主義是客觀實際抽出來的理論，但那是歐美的客觀實際。在中國的客觀實際抽出來的理論，無論如何也不致抽出馬列主義來的。三民主義所以不同於馬列主義，就爲了兩者所根據的客觀實際各有不同。馬克生於一八一八年，中山先生生於一八六六年，兩人的時代，雖同在這一百年的歷史以內，而他們所處的時代環境，質量上都顯然有異。近百年內的社會問題，無論如何複雜，歸根到底，要不外民族、政治、經濟三大問題。馬克斯的時代，正處於歐洲尤其是英國產業革命浪潮高漲的時代，三大問題中歐洲的波瀾迫者感到迫切需要解決的，要算「經濟」一個問題。在中山

先生的時代，這三個問題不但毫無解決，而且日愈深化的統一起來，要解決某一問題，其他兩個問題便不能不同時解決，而這一時期中，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民族問題，尤為嚴重。所以馬克斯從「經濟」的觀點出發，結果便主張階級鬥爭，中山先生從三個問題的實質「民生」出發，從次殖民地的民族生存問題出發，所以特注重於民族革命。馬克斯處在歐洲產業革命後勞資鬥爭尖銳化的時代，中山先生是處在帝國主義壓迫殖民地弱小民族到白熱化的時代。前者的時代是內在的經濟問題的嚴重，超過民族政治兩問題，後者的時代是外在的民族問題的迫切，超過內在的經濟政治兩問題。以歐洲來說，經濟問題不能不急謀解決；以中國來說，在先和侵略主義抗戰而解決民族問題的過程中，三大問題便不能不同時解決。因此馬克斯便創造出他的暴力的共產主義，而中山先生則創造出了他的博大的三民主義。

中國的客觀實際所產生的理論，既然是三民主義而非馬列主義，可是毛澤東仍然祇看見書架子上的馬恩列斯的現成文獻，仍然死死背誦馬克斯主義的方法及其「教條」，

不得半端分析中國的實際問題，找出他的發展規律，竟一再反覆的去勸告他的黨員，要他們以適用於歐洲革命的馬列主義之箭，去射中國革命之的，却不依照中國革命之的，去心口如一的去取那「爲今日中國之所必需」的三民主義之箭。這就是說不是爲了適應而轉展，反是爲了適應而削足。牠的腦袋中，才真正是安置着根深蒂固不折不扣的主觀主義。

由於毛鄒東亞親的以馬列主義之箭去射中國革命之的，所以他對於中國革命的歷史行程上的一切社會問題，都是戴上馬列主義教條公式的眼鏡來看的。所以他說：「在現在抗戰的階段與敵寇壓完或民主共和的階段，都是三民主義的階級，都是香港階級民生革命性質的階段。」；在中國，任何忠實的馬克思主義，他是同時具有兩重實質：在孫與將來遠大理想所擔負的。……所謂將來的遠大理想，就是共產主義。……所謂現在的實際任務，就是三民主義。」（見論新階段）他將三民主義看爲祇限於現在的實際任務的一個階段，將共產主義看作是脫離了三民主義的一種遠大理想。這樣的看法，當

然是依照封建——資本——社會的歐洲歷史法則的三階段論，機械的移來觀察中國的革命歷史行程。他以為中國革命應該一絲不改的走歐洲革命所已走過的道路。這種思想對於落後國家思想預防的必然性，未免過於忽視。他不知落後國家的人民，倘已認識工業先進國家社會進化的歷史法則，對於資本制度之爲害他們就能夠引爲前車之鑒，若說次殖民地的中國，已經認識了歐洲的資本制度是人剝削人的制度，難道還要讓這種有害的歷史行程再重複的在中國扮演一次嗎？中國人民決不會如此愚蠢！毛澤東不過是片面的觀察歐洲革命，沒有全面的觀察中國的革命。所以他的學風才真是他所說的片面的經驗主義，換言之，就是另一種低級的主觀主義。

總之，毛澤東的主觀主義，確實是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兼而有之。他既不能將馬列主義書架上的書本知識從中國的客觀實際求得證明，他又不能從中國的客觀實際正確地認識民主主義的道理，他永遠的抱着一支馬列主義之箭，來射中國一切社會問題之的，於是中國各種問題都爲他的馬列主義而主觀化了！

### 三 對於中國問題熟視無睹

毛澤東說：「如果我們身為共產黨員，却對於中國問題熟視無睹，……那末，在理論戰線上的成績就未免太壞了。」但是毛澤東自己對於中國問題是否已經看清楚了呢？真如他自己所說：「天天看，看不見；帶了眼鏡，還是看不見；看見了的仍就是書架上的馬恩列斯的那成文獻」！這幾句話，透澈極了。

就拿政治問題來說吧。毛澤東自抗戰以來，他沒有一天不高呼民主政治，他說：「民主政治是發動全民族一切生動力量的推進機，有了這種制度，全國人民的抗日積極性將會不可計量地發動起來……」

然而他對於中國國民黨數十年來爲了民主政治的艱苦鬥爭，他是熟視無睹的。好像在他沒有提出民主政治的口號以前，中國並沒有人提倡過民主政治，實施過民主政治，祇有他提出了這口號以後中國的民主政治才算開始。可是國民黨摧毀數十年的專制，創

立了共和國，究竟這是不是爲了建立民主政治？民元以後，自討袁議法以至於出師北伐，掃除封建軍閥，這是不是爲了建立民主政治？十餘年來，我們有建國大綱，規定建國的程序，有訓政時期的約法，規定政府人民的權利與義務，並陸續制定了許多民刑法典，使人民權利獲得了切實的保障，而且更加緊的推行地方自治，這又是不是爲了建立民主政治？然而毛澤東的眼睛不知到那裏去了，他無論如何是看不見的。

中國國民黨明明正在艱苦的爲爭取民主政治而鬥爭，爲什麼毛澤東還要天天叫嚷民主政治呢？第一，就是爲了他要造出一個掩護他的自由行動的烟幕；第二，就是爲了他要轉變全民政治爲階級的政治。所以他之要求民主政治，完全是由於他的主觀主義所形成。

因此，毛澤東每一次談到民主時，他必然要和自由併爲一起。「民主自由」，在他看來，簡直成了一個名詞。爭民主，就是爭自由。爭什麼自由呢？那當然是爭割據邊區的自由，無限擴張的自由，煽動民衆的自由，毀謗政府的自由，紊亂金融的自由，權權

影片向自由，鼓吹紛歧思想的自由等等。他對於中國的客觀實際，究竟是否需要這些自由，完全沒有看見，甚至也不願意看見！

考實說，中國客觀實際的問題，在民主方面，決不是爭個人自由的問題。中國五千年的歷史，除了少數暴君如幽厲秦皇在極短時期限制人民的自由以外，一般的君王對於人民皆採取放任主義。那歷代定於一尊的儒家學說，向來就以不假苗助長爲訓。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含哺而熙，鼓腹而遊』，乃中國政治哲學所希望於人民的。中國民衆不但不缺少自由，甚至自由到不知自由之可貴，正如空氣陽光多到人類不知其可貴一樣。中山先生說：『由於中國人自由太多，所以中國要革命。中國革命的目的與外國不同，所以方法也不同。』『歐洲從前因爲太沒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爭自由。我們是因爲自由太多，沒有團體，沒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鬥爲是一片散沙，所以受了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受列強經濟商戰的壓迫，我們現在便不能抵抗。要將來能夠抵抗外國的壓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結成很堅固的團體，像把士教士參加到數

沙裏頭，結成一塊堅固石頭一樣。」

中山先生這一個理論，才真是對準了中國的實際問題，由中國具體的客觀環境逼出來的真理。毛澤東看不見中國這一個現實問題，弄到如今，還將民主與自由攪在一起，以致集中的力量分散，統一的思想紛歧，由他的這一理論出發，勢必至使中國的抗戰建國工作不弄到散沙的狀態決不停止。

他對於民主除了帶着自由的意味以外，他又掩着眼睛而以階級的觀點來作分析。依他的觀點，全世界的民主主義，祇有三種：第一種便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以英美為其代表，這可稱為舊民主主義。第二便是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以蘇聯為其代表，這可稱為最新的民主主義。此外便是各階級聯合的民主主義，這一種民主主義的形式，是由革命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所產生的。這就是新民主主義。在今日中國的政治形式，他以爲即屬於第三種類型。

然而他的這樣分析，究竟是根據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客觀實際呢？抑仍是根據一



書架子上的馬恩列斯的現成文獻呢？他所舉以分析的根據，屬於後者而非前者，是誰也容易看出的。須知所謂殖民地半殖民地，即是指一切工業落後而國而言，工業落後，階級便必然沒有明顯的對立與分割，換言之，即無所謂真正能夠有一階級的階級。階級既沒有形成，又何談各階級的聯合呢？倘若謂中國之貧，即指中國的小貧為資產階級，這本來就第一的整個民族障礙之為各階級的聯合戰線，這不過是毛澤東主觀上的「教條主義」而已！

一個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政治的構成力量，絕不能講是各階級的代表力量。這力量是各民族的先知先覺與後知後覺所構成的。一切被壓迫民族中的這些份子，並不以階級為其基礎，他們並不屬於某一階級而是屬於整個民族。從過去的革命史看來，被壓迫民族中的革命份子，並不限於被壓迫的某些個人，乃是屬於被壓迫的整個民族的。所以國民黨是農工商學兵的先知先覺及後知後覺所組成的一個民族政黨，絕對不是代表某一階級的黨，也是為此。

毛澤東完全不看一看中國的實際問題，他不僅幻想出一個中國的資產階級，同時幻想出一個中國的無產階級，而且還幻想出一個中國的資產階級的黨，一個中國的無產階級的黨，依他們的邏輯，中國的政權將來必然由資產階級的黨轉移於無產階級的黨，到那時候，共產黨便要粉墨登場，國民黨的命運便為歷史所註定了。於是中國的將來，也必然有一個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十月革命。

這樣的理論，真是張天師的符咒，陰險有詞，像煞有介事的。其實依然是一種死的「教條主義」！

#### 四 粗枝大葉自以為是

毛澤東被討論他的全黨過去的理論及理論家以後，他這樣說道：

「你們看，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我們究有多少人創造了算得稱為『理論』，算得稱為科學形態的，週密的，而不是粗枝大葉的理論呢？特別在經濟理論方

面，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從鴉片戰爭到現在，已經一百年了，但是還沒有產生合乎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的，真正科學的一本理論書。……能不能說我黨已經有了這樣的經濟理論家呢？實在不能說。」

的確，中國共產黨的經濟理論家，都不過是一些俄國貨的販賣者，連篇累牘，輾轉抄襲，不但他們不能自己創造一本合乎中國經濟發展實際的理論書，就是別人已經創造了一本最切合國情的書，如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吧，他們也還是沒有能力去充分的了解。這樣的現象，不僅他們的黨黨員，即毛澤東本人，也未嘗有何例外。抗戰前的情形不必說了，抗戰以後毛澤東所堅持的經濟理論與其經濟政策，又是否合乎中國的經濟發展的實際呢？據我們看來，正如他自己說的「粗枝大葉，自以爲是。」這確實是坦白  
的自發批評。

毛東在論新階段中，對於改良民衆生活舉出了七項辦法，對於實行新的戰時財政經濟又提出了政策十項，據說：若實行了前項的生活改良辦法，工農貧民羣衆擁護政府

參加戰爭與生產的積極性必能大大提高，若實行後面的十項政策，便能將財政金融的種種困難予以克服，然而我們詳細的研究起來，他的這些政策辦法，差不多等於一些最起碼的宣傳所用的標語口號，各項政策之間，拉雜堆砌，既未基於一定的原則而相互配合，更沒有能夠切合現實環境的施行程序，其作用祇在於唱高調以博民衆的同情，利私圖而謀取勢力的擴張罷了。中國民衆的生活爲什麼陷於這樣悲慘的境地呢？這個問題如果我們展開的看來，簡直是關係於整個革命的目的問題。我們的革命一日未完成，則民衆生活便一日不能積極的澈底的改善，就是說革命的對象日本帝國主義不驅逐出境，民生建設的實業計劃不逐漸完成，民衆生活改良的實施條件依舊是有限的。例如工資與失業兩問題，毛澤東祇提出要予以適當的增加與救濟，但究竟怎樣才能予以適當的增加與救濟呢？爲什麼現階段中尚不能得到圓滿的解決呢？方法如何？困難何在？這就應該有精密的調查與設計。倘若祇高調改良民衆的生活，而不詳細的研究用什麼，方案去改良，祇憑口號語運篇，口號滿紙，還不是一些「粗枝大葉」的調劑兒！

全部三民主義，尤其是民生主義，老實說就是爲了改善民衆生活而創造出的一種主義。中山先生知道欲謀民生問題的解決，當然不是一些捉襟見肘的消極的改良辦法可以收效，他除了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之外，他還要積極發達國家資本，使中國的社會高度工業化，要在中國產業十分發展之中，來提高民衆的生活水平，然後才有改善生活的積極的意義。

關於他所提出的新的戰時財政經濟政策，那更是東湊西拉，言之無物。例如第一二三數項，都祇是題中應有，那來所謂「新」的意義？尤可笑的，第四項所謂保護工商業的自由營業，究竟中央何時何地剝奪了工商業在法律上的自由呢？再說，在現階級經濟已成爲必要的政策的時代中，還要來鼓吹工商業的營業自由，中共的倒車不知開到了十九世紀還是十八世紀！至於第七項，他竟主張允許設立地方銀行，發行地方紙幣，這尤其不祇是錯誤，其結果不過破壞國家的法幣政策使整個金融紊亂罷了。吾黨憲法區由於實行這一政策，他們竟敢禁止人民行使法幣而以中共的偽幣吸收，這樣的行爲，早

已和敵偽漢奸沒有什麼差異。

可見毛澤東的經濟理論或經濟政策，實在並不是爲了抗戰，也不是爲了建國，他的唯一目的，祇是爲了發展他一黨的勢力，鞏固他邊區的政權，歸根到底，終不過爲了實行他主觀上的馬列主義而提出的。

由於他先有了一個主觀上的馬列主義，所以他對三民主義或民生主義，都是以馬列主義來加以解釋。所以在他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中，竟謂 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和他們的沒收土地的政策是一致的。他解釋新民主主義經濟中有一段話這樣說道：

「它將採取某種必要的方法，沒收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無地及少地之農民，實行孫中山『耕者有其田』的口號，掃除農村中的封建關係，但不是建立社會主義的農業，而是變爲農民的私產，農村的富農經濟，也是容許其存在的，這就是『平均地權』的方針。這方針的正確的口號，就是耕者有其田的口號。」

從這一段話看來，可證明毛澤東學習 中山先生的遺教，是何等的粗枝大葉。他解

釋：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實施，係採取沒收大地主土地的暴力方法。我們讀派遺教，從來沒有見中山先生這樣的主張過。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演講，都是民國十三年八月那一個月所發表的。先生認為「將來民生主義真是達到目的，農民問題真是完全解決，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們對於農民問題的最終結果。」但耕者怎樣才能有其田呢？他固落這樣說過：「現在俄國改良農業政治之後，便推翻一般大地主，把全國的田地，都分到一般農民，讓耕者有其田，……這是一種最公平的辦法。我們現在革命，要做效俄國這種公平辦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徹底的革命。」（農民講習所訓詞）大概毛澤東讀遺教讀到此，他一定大喜欲狂，把下文就忘記了。這樣一來，他們在江西蘇區實行的土地革命，就可自詡爲有了中山先生遺教的根據。所以他在新民主主義的講詞內，才敢大書特書，謂沒收大地主的土地是實行中山先生土地革命的必要辦法。然而中山先生在說了此話之後，他却繼續的說：

「中國的人民，本來是分作士農工商四種，這四種人中，除農民以外，都是小地主

。如果我們沒有預備，就做效俄國的急進辦法，把所有的田地，馬上拿來充公，分給農民，那些小地主一定是起來反抗的。」<sup>1</sup>「我們此時實行三民主義，如果馬上就要耕者有其田，……受地的農民，固然是可以得利益，失地的地主，便要受損失，但是受損失的地主，現在都是稍爲明白事件的人，對於國家大事，都很覺悟，而一般農民，全無覺悟。如果地主和農民發生衝突，農民便不能抵抗。」<sup>2</sup>

毛澤東學習了上面一段話，爲什麼立刻便拋棄了這一段話呢？這當然是由於他的學習工具，原祇有一個粗疏闊大的馬列主義的篩子，用了這個主觀的篩子，來讀中山先生的遺教，合於馬列主義的文句，就選了出來，否則便被拋棄出去了。

## 五 對敵友我三方面的動態全不了解

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向他的全黨，曾提出三個建議，第一個建議要他們了解敵友我三方面活動的狀況。他說：



「依據歷史唯物論，對敵友我三方面的經濟、財政、政治、軍事、文化、黨務各方面的動態應進行調查研究工作，然後引出應有的不必要的結論。」「共產黨員及其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就在於了解情況與掌握政策兩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謂認識世界，後一件事，就是所謂改造世界。」

這段話當然是一番大道理。可是毛澤東自己對於敵友我三方面的動態，究竟真正的了解沒有呢？這也是應當檢討一下的。現在我們且以外交問題為例。

毛澤東的外交，向來是構爲陣綫的外交，基於他們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原理，國際間的外交陣綫，依他看來，因而也祇有兩個陣綫。前幾年喧嚷一時的法西陣綫和民主陣綫，就是他們的出品，然而這樣單簡的兩分天下論，在訓練黨員和小學生時，倒不失爲「以簡御繁」的效用。不過國際形勢，錯綜複雜，千變萬化，所謂兩條陣綫，事實上有時候便不存在，甚至攪得模糊不清。所以德蘇協定一成立，他們便手忙腳亂，目瞪口呆了！於是舊的陣綫外交便告一結束。這雖是兩三年前的事，而他們的「套主觀公式依

總求不更改。終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德蘇協定以後，毛澤東又發表他的新陣綫論。依他的新陣綫論，德意日爲法西斯集團，英法爲法西斯化集團，中美洲南美洲以美國爲首的是一個資本主義集團，蘇聯呢？沒有集團，就祇好孤立在社會主義的另一世界了。集團雖多，可是在毛澤東的眼中，仍然祇有兩條陣綫，德意日的法西斯主義，與英美的資本主義，兩者都和社會主義是對立的。前者是頑固落伍的，倒退的，反動的，後者是前進的，天才的，光明的，是支持世界和平的。

總之，世界上祇有勞資兩個階級，中間階級，決不存在，而且勞資兩階級的國家必不走到同一路綫，非敵卽我，非我卽敵，他決不承認敵我之間，還有所謂「友」者。

當德蘇協定時，毛澤東根據這個觀點，發表了一篇談話，叫「論目前國際情勢與中國抗戰」分析這一篇談話，他不僅不認識自己，而且也不認識敵人，至於友人，他簡直認爲沒有存在。譬如德蘇協定，由許多小國的觀察，認爲棋局上或有這一看，已經有數年之久，毛澤東却以爲是突然發生的。因爲蘇德當時既已妥協，毛澤東也就勸我們何妨

聯攻出友，也與德國接近。蘇德協定的責任，他以為是由於英法蘇談判之失敗，當時他既轉而仇視英美，竟譏告我們單獨轉歸，這些舊事，現在也不必多提了。祇是我們回想起來，幸而當局沒有接納他的高見，否則，後來德蘇戰爭爆發，日蘇又繼續簽了中立協定，試問我們的外交不是要進退維谷呢？毛澤東叫他們的黨員，要根據辯證的歷史唯物論來研究敵友我三方情勢，依上述的情形說來，辯證法的唯物論，用來和他人高談闊論，逞一逞口舌之辯，倒也未嘗不可，若果要用來分析敵我與國際關係其複雜的外交情形，而用這一套正反合的簡單公式，那確實是誤誤國民！

無論任何一國的外交，都莫不以自己的利害為基準。所以我們的外交綱領，第一便是本獨立自主之精神。聯合世界上同情於我之國家及民族，共同奮鬥。助我者友之，助敵者敵之。對於世界各國現在之友誼，當益求增進，所謂多求友，少樹敵，這是我們外交綱領的基本精神。本此精神，我們對於他國的外交，即或於我不利，我們亦不十分驚異。即如日德中立協定，就蘇聯的利害來說，這是大家早已料到可能有的事。國際間利

害第一，正義第二，正義仍基於利害而來。蘇聯固為我們的友人，而且私曾給我們以精神與物質的援助，但當他們西方的形勢吃緊，而力量不能裕面作戰，要鞏固東方的和平，以加強西方的防禦，在人家的處境，原屬無可厚非。我們也沒能體會。不料毛澤東一方面既以抗日為標榜，他方面又以國際為路線，日蘇中立協定簽字，他們便又小免張皇起來。所以當時有人說道，日蘇協定後中國共產黨這一名稱，究竟塗去「中國」一詞而改入蘇聯國籍呢？抑或甯死要做中國人，把「共產」一詞塗去呢？這雖是一句笑話，也可以看出他們那時進退維谷的處境。不過，我們看得清楚，倒可以安慰他們一句，日蘇協定終究是畸形的，必有一天可以使中共再掉過頭來站在蘇聯立場來痛罵日寇的。放心罷！

毛澤東既不能認識本國的國情，又不能認識蘇聯的境地，尤可惡的，他還要仗仗外力的去曲解這次協定的原因。他說：「蘇日條約，沒有限制蘇聯援助中國進行獨立正義的對日抗戰，只要中國政府的方針，是堅持民族解放的獨立戰爭，只要中國政府，對於

蘇聯的援助，是用以反對日本侵略者，而不是用以反對國內同胞，……深信蘇聯是會繼續援助中國的。」依他這一解釋，好像蘇聯之簽日蘇協定，並不是如莫洛托夫所說全爲了他們祖國的和平，反而是爲了我們中央制裁中共的蘇皖叛軍所引起。這樣的無恥的分析，不但證明他沒有真正的認識蘇聯，而且赤裸裸的暴露出所謂中國共產黨也者實與「中國」無關。不說別的，祇要從德蘇協定到德蘇戰爭，這一時期，他對於希特勒始而稱之爲「法西斯強盜」，繼而稱之爲「德意志的元首」，終而又回復到「侵略主義的瘋狗」，不到一年，態度三變，而其變又完全隨着蘇聯的脚跟，真所謂蘇之所好好之，蘇之所惡惡之。毛澤東對於敵友我認識的膚淺也就可以證明了。

## 六 對於中國昨今的歷史漆黑一團

在毛澤東整風演講中，他好像感覺到他們的幹部，都不懂得中國歷史。所以他特言之諄諄的加以告誡。他檢討他們黨員的結果，認爲他們「對於自己的歷史一點不懂。或

懂得很少，不以爲恥，反以爲榮。『特別重要的』近百年的經濟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教育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簡直沒有人認真動手去研究。『有些人從歐美日本回來，只知生吞活剝的搬外國，他們起留聲機的作用，忘記了自己創造新鮮事物的責任，這種毛病也傳染了共產黨。』

毛澤東這個批評當然是很正確的。可是我們要反問一句，他自己『對於中國昨天前的歷史，是否懂得了呢？』他自己是否也『祇懂得希臘，不懂得中國』而漆黑一團呢？這也應該加以檢討檢討。現在就以他發表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的分期爲例。他說：

『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百年中，分爲前八十年與後二十年兩個大段落，這兩大段落中，各有一個基本的帶歷史性質的特點，卽在前八十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屬於舊範疇的，而在後二十年，由於國際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却屬於新範疇了。舊民主主義——前八十年的特點，新民主主義——後二十年的特點，這種區別，在政治如此，在文化上也是如此。』前八十年與後二十年劃分的界石，他當然指的是『五四』。

這種文化的分期，可說完全是一種最主觀的武斷。所謂新舊民主主義究何所指。倘若說舊民主主義的文化運動，係指廢復辟的翻譯事業，及康梁的君主立憲運動，那末，這種運動既不始於鴉片戰爭，也不終於五四。康梁的維新運動，起於一八八四年的中法之役，到戊戌政變失敗後，康梁逃往國外，便早已消滅。若謂新民主主義的運動，即是指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運動，但他又何以說新民主主義運動是以五四開始？這當然又是大錯。即依他的解釋，謂新民主主義是真三民主義，真三民主義是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解釋的，那末，新民主主義運動應該始於民國十三年，也不應以五四來劃分時期。可證他的言論實可說是前後矛盾，支離滅裂，完全是一種與歷史不符的瞎話了。尤其是荒謬的，便算他對於五四的認識。他以為「在五四以後，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世界觀與社會革命論。」然而要知道五四的文化運動是一個什麼性質，必先知道五四運動是一個什麼運動。好在五四運動的若干猛將，至今仍尚健在，從他們近來發表的回想文字

中，可以看出五四運動明明是受三民主義影響下的民族意識覺醒運動，也就是一個民族解放的救國運動，不容曲解，也不能曲解。五四運動的爆發，由於外交的刺激，上次大戰停止，我國本來是一個參戰國，德奧既是我們的敵人，德在山東的權利，當德國潰敗，自應由我無條件收回，然而竟為日寇橫攫而去。這是國際外交間未有的創例，也是我民族的奇恥大辱。當日政府的忍辱外交，自然為人民所不能忍。於是學生運動，商民運動，工人運動，匯而為全民族的整個抗日救國運動。這運動很明顯的沒有帶一點階級的意識，和共產主義可謂完全沒有什麼關係。五四運動雖同時是一文化運動，而其文化運動的中心，是注重於語體文的建立及西洋思想的介紹，其所介紹者，固然有馬克斯主義，但所謂德謨克拉西的民主主義，無政府主義，正國主義以及其他一切的社會主義也在介紹之列。五四所標榜的『德』、『愛』兩先生，在馬克斯主義者看來，這一位德先生自然是屬於資產階級的思想，而那一位愛先生，多半是注重發展工業的自然科學，他們其時也看為是屬於資產階級的，那時參加五四運動的人，祇有很少數的幾個馬克斯主



續的研究者，倘沒有什麼共產黨，中共的組織在一九二二年才開始，不但五四運動未及由牠領導，而中共的組織反是由五四運動的浪潮所產生的。毛澤東謂五四以後的文化思想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但所謂「以後」，試問一九一九年（五四）到一九二二年（中共開始組織）間中國文化運動最先發達的兩三年，共產黨尚未成立，又怎能領導？這些胡纏的話，真是不知其所云。歐共產黨成立以後的十幾年的文化運動，好像有一些左傾的趨向，但也說不上是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以他們認為這時期的中國文化主將的魯迅而言，我讀他的全集中，也找不到魯迅自己公開承認他是共產主義者的表示。魯迅初期的魯迅，大受共產黨的攻訐，這是衆所周知的事。魯迅骨頭確實有些硬的，但他越爲反帝反封建的硬，不一定便是爲了皈依共產主義才硬了起來，而反帝反封建者不一定便是共產主義者。坐拉活扯，自欺欺人。他對於中國的歷史的分析，真可謂漆黑一團。他分析歷史的工具，仍然是那一套死的機械的馬列主義的主觀公式。

毛澤東現在口口聲聲都在說，要造成民族的民族文化，必果要「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

過程」。他也認爲「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舊文化發展而來，我們必須尊重歷史，不詭詞斷歷史。」然而一方面他又謂尊孔讀經，是提倡舊禮教舊思想反對新文化新思想，實則現在的尊孔讀經，誰又是無批判的兼收並蓄呢？誰不是主張剔除其精粹而吸收其精華呢？誰又是在提倡全盤復古而不給以一定的科學或哲學的地位呢？試問中國的民族文化，除了儒家學說，還有什麼較大的成分，而且還有什麼可以自別於他國的文化？現在大家都已逐漸承認，如果印度以宗教文化稱，西洋以科學文化稱，那末，中國硬要以哲學文化尤其是政治哲學的文化自負了。中國的文化思想，雖分爲儒、老、墨三派，但老氏主虛無，近於宗教，墨家主實用，近於科學，祇有孔子兼各家之長而歸於政治哲學的建立。所以如果要「尊重歷史」，尊重我國文化思想的傳統中心，從而創造新民族文化，則拋棄儒家學說的一種主張，可說真是南轅而北轍了。

## 七 爲馬恩列斯而馬恩列斯

毛澤東談論理論與實際的聯繫，他這樣告誡他的同志，他說：

「馬恩列斯曾經反覆的講，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中國共產黨人，祇有在他們拿了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應用於中國，從中國歷史實際與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創造出理論來，才叫做理論與實際相聯繫」，否則便是「爲馬恩列斯而馬恩列斯。」但是馬列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又將怎樣應用於中國的實際呢？他說：「馬克斯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因此，馬克斯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表現中帶着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把國際主義底內容與民族形式分離起來，是一點也不懂國際主義的人們的幹法，我們則要把二者緊密地結合起來。」自從毛澤東發了這篇大議論以後，於是「民族形式」啊，「中國化」啊，這一類聲音到處叫起來了，毛澤東也許要引以自慰吧。

然而馬列主義能否中國化呢？假若可能，中國化究竟如何解釋？在我們看來，馬列主義，是不能中國化的，否則便要根本變質。但變了質的馬列主義，是否還可以稱之爲

馬列主義，那又大成問題了。馬列主義是歐洲階級鬥爭的產物，牠的歷史背景是階級社會，所以牠是從內在的矛盾出發，而鬥爭的對象是內在的。中國的歷史背景，是次殖民地社會，階級分化不明，全民族都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因而牠的革命，是民族革命，這革命的出發點是外在的矛盾。由於外在的矛盾，便不能不需要內在的和諧，於是階級鬥爭的必然是三民主義。一個以內在矛盾為中心原理的馬列主義，要化於以外在矛盾為革命目的的中國，這個矛盾便不能辯證的統一起來了。

倘若說，馬列主義可以中國化，那麼，所謂中國化，便有以下幾種解釋：

第一，以馬列主義為內容，化裝為民族形式。

第二，不是馬列主義中國化，而是以馬列主義化中國。

第三，以馬列主義與中國客觀實際所產生的主義即三民主義混合起來，想用鑿棄虎皮的法，造作魚目混珠的贗品。

我們以為毛澤東的中國化，不外這三個樣式。假如毛澤東時中國化，確不外乎這三

個樣式，那末，他所常說的理論與實際聯繫的問題，就不是從實際抽了理論出來，而是在實際的身上發上一件以某種主義為理論的大衣而已。第一，他雖然高唱學術中國化，所謂學術，當然不是自然科學，自然科學原理絕對不致因國家的不同而改變的。可是他並不是指一般的社會科學。老實說，他心目的學術祇唯一的暗示着馬列主義。而所謂「中國化」，完全是一種宣傳的技術問題。因為他們過去的宣傳若不是一種洋八股的形式，便是一種空洞抽象的調頭，現在要使馬列主義容易宣傳起見，祇好改變成為西洋教士傳佈的方法或作風，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毛澤東語》）這不過是將宣傳馬列主義的文字變為中國氣派罷了。

他第二種解釋，那便不祇是一種技術問題，而是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馬列主義，換言之，就是其在中國的客觀實際上去研究怎樣去應用馬列主義。馬列主義是不變的，改變的是實際的條件，為實施馬列主義的方法更切合於中國的實際。這樣一來，不是以中國化為列主義，而是以馬列主義為中國，問題祇是在化的方法要如何才能更有效力。

此外，便是以馬列主義來解釋中國的學術思想及其發揚光大的三民主義，將三民主義與馬列主義混淆起來，使人不辨真偽，於是才能假中國學術思想或三民主義之名，而行馬列主義之實，減少抵抗力，俾得暗地裏施其詭計。

由以上的分析看來，毛澤東的馬列主義中國化，那裏是從中國的歷史實際與革命實際的研究來創造新的理論。依然是以歐洲已形成的馬列主義全部抄襲來設法運用於中國的客觀實際，那就是說他仍然「爲了馬恩列斯而馬恩列斯」，仍然擺不脫，跳不出，割不斷他那根深蒂固不折不扣的主觀主義！

## 八 一個結語

綜合的說來，毛澤東是想拋棄他的主觀主義的，但他不知道他自己就有一個牢不可破的主觀主義——即想在中國來實行馬列主義，這馬列主義竟和毛澤東自己的影子一樣，他越是想離開他，牠越是跟着他！

6673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九月初版

整風運動研究

定價國幣一元

版權所有

著者 張鐵君  
印行者 勝利出版社  
總經售 文信書局

重慶保安路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在證世圖字第三一四六號